

# 乡村学校:何以至此,以此至何?

叶晓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本文基于一篇描写乡村学校变迁的教育人类学文本展开讨论,将乡村学校定位于“村落中的国家”和“村落中的城市”,认为近百年的公立教育的变迁并没有对农村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作为嵌入乡村的学校,在国家力量与城市想象的双重催化下,一步步走向衰败,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学生,逐渐远离乡村,却又不能因此抵达城市。本文试图通过对“农村教育为何走到今天的困境”和“农村教育何去何从”两个问题的思考,为我国农村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一个讨论的思路。

**关键词:**农村教育;乡村学校;“村落中的国家”;“村落中的城市”

**中图分类号:**G521 **文献标识号:**A **文章编号:**2095-1760(2011)04-0101-11

## 一、问题提出

我们的讨论从一篇利用人类学社区研究方法进行一个小型社区(村庄)近百年的教育变迁研究的论文开始。<sup>[1]</sup>作者的一个判断是:“处于村落之中的学校,实际上处在村落规范、外部空间(如国家、政治等)的紧张之中”。作为深入村落的国家力量,近百年来乡村学校对村落儿童的生命史所产生影响不断增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校所喻示的现代性力量在与村落所喻示的传统力量之间的竞争中逐渐占据强势地位,“占据了村落儿童几乎所有的时空”。

从方法论上来说,村庄的社区研究展现的是这个村庄的关系机制,接着即是与这个村庄相联系的中国农村教育的宏观因素。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从这篇论文出发,讨论乡村学校变迁中所关联的地方生计传统、国家教育体制改革、传统教育理念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对于乡村学校的变迁,容中逵(2009)认为总的历史趋势是传统向现代的挺进,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作为文化特质不

收稿日期:2011-08-15

作者简介:叶晓阳,男,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同的传统与现代二者之间的交锋与博弈,而一切变迁均出于不同历史时期二者自身体系严谨性与生机控制性的较量,这一较量的具体实践及其结果由某一历史时期的总体政治、经济环境及二者在博弈过程中为人们所认同与接受的程度息息相关”。<sup>[2]</sup>

进一步地,作者强调乡村学校“是在国家、地方、村落等主体之间的互动中展开的”。这展现了国家力量是如何一步步深入到地方社会生活之中的,因而,对一个微观的社区进行观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大时代、大社会的变迁。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国家力量渐渐从村庄生活中退出的历史趋势,在新的情境和社会空间下,乡村学校何去何从,是我们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在作者那里,这个问题是如此表述的:我如何成为了现在的“我”,他们如何成为了“他们”?教育首先是一个“成为人”的过程,乡村学校或者乡村教育,是生活在乡村的儿童和村民“如何变成他们自己的”最重要的过程之一。作者在写作这篇论文的背后所持有的“对命运的反思和情怀”,使得这篇论文在叙述个人的生命史的时候,拥有了打动人心的力量。我们的乡村学校,能够对所处其中的村民的人生和命运产生格外重要的影响,不仅关乎一个人的一生,也构成了一个村庄社区的数十年变迁的基本动力。

这或许构成了我们投身农村教育研究的最朴素的理由。对于农村教育研究,本文的分析基于两个基本假设:乡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也是“村落中的城市”。被关注得较多是前者(如李书磊,1999<sup>[3]</sup>;李红婷,2010<sup>[4]</sup>),在我们可以观察到的现实之中,现代学校的兴起和国家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实质上都是国家权力进入乡村的一种,乡村学校作为国家机器的终端触角,一方面为乡村的未来村民们提供现代教育进而进行社会同化,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奇怪的机构”参与到乡村的日常生活。作为“村落中的国家”的乡村学校给乡村带来了现代化,但它又作为“为人民服务”选拔机制的一部分,像流水一样带走了乡村土地的养料。

但其实,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渐渐进入乡村,乡村学校更多的是以“村落中的城市”的面貌出现在村民的视野里:一方面城市导向的现代学校教育设计使得学校成为了乡村中的一块“飞地”,学校里的学生则获得了一种变形的“伪城市经验”;另一方面,脱离了乡村生活的学校教育培养了一代远离土地却又难以在城市立足的“无根”青年,洪水一般地冲刷着乡村的土地。当我们试图关注农村教育问题,去思考农村教育究竟该如何才能得到发展和进步,去回答“从乡村学校里走出来的他们是如何成为他们自己”的时候,这两个假设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解释的思路。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正是在乡村学校是“村落中的国家”和“村落中的城市”两个假设的基础上展开讨论的。

## 二、何以至此?

这篇论文采用了一个较为新颖的叙述结构,在“引子”和“尾声”中讲述同一件故事,两者之间则在时间线上逐步展开,对大时代、大社会逐步聚焦,回答在“引子”中提出的困惑:何以至此?

从表面上来看,作者引出的故事与我们讨论农村教育的框架没有过多的关联;几个家庭联合起来聘请老师在家里教学(家庭私塾教育),正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退出了制度内的学校教育。然而,当我们试图去寻找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的时候,会发现它其实是我国农村教育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一方面,从学校教育来看,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进而我们要去考察我国公立教育的发展历程,义务教育分权化和基层政府财政能力的下降,教育资源的地区和城乡不平衡状况的加剧如何导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状况的恶化,乡村学校是怎样一步一步衰败的;另一方面,从村民的角度来看,家庭私塾的再兴起(私塾教育是现代学校兴起之前农村教育的主要形式),可以视为传统中国乡村居民的父母对学校的不满和抵抗,用他们传统而且最朴素的方式对外来力量所进行的“用脚投票”。然而,令人担忧的是,这个故事的发​​生不一定意味着农村教育的发展在人民的智慧之中找到了一条新路,人民退出“作为村落中的国家”的乡村学校教育,却是为了能够在“作为村落中的城市”的农村教育乃至城市教育中谋得一席之地。

作者将这个事件(家庭私塾的谋划)置于乡村所处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试图从如下三个方面来回答“何以至此”的疑问:(1)乡村的教育传统与教育对乡村的作用;(2)作为“国家”的想象体,乡村的公立学校作为外来组织结构,与乡村生活的互动关系;(3)在“城市入侵”的新时期,私立学校作为居民与公立学校对立矛盾的一个缓解,在乡村的兴起和变迁。作者在叙述村民与国家的关系的时候较为清晰地勾勒出了半个世纪以来人民与政府的互动。然而,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侵入却是“润物细无声”的,作者生动地描绘了很多乡村学校的瞬间和村庄的生活,在“超文本”意义上,进一步启发我们对乡村学校的思考。

文中的仁村和中国绝大多数的乡村都类似,经历过旱涝灾害、战乱饥荒,随着工业和市场的介入,传统生活趋于解体,新社会组织形态正在萌生,与外界似近实远,与周边如封似闭,家族和宗代的概念在逐渐变弱,这也是农村教育面临的环境变革。将时间线拉长到整个20世纪,我们会发现乡村的教育与教育传统的变迁一直有两条主线:新式学堂的强势兴起(国家意志和政策在微型社区的投影)和传统私塾的微弱延续(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形成了一种新传统,激烈的升学竞争带来了私立教育部门的兴起)。

作者在文中叙述了村庄内部的个人教育史,从这些作为嵌入乡村的学校生产出来的人的生命史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教育对于一个人的终极意义:它使他们终于成为了“他们”。从仁村的一个世纪7代村庄知识青年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对斯文、社区地位、荣誉等的追求给农村教育带来了悠久而优良的传统,家族内部的延续和代际影响非常明显。然而随着大家族的瓦解,这种影响也在逐渐虚弱,而远离乡村日常社会生活的现代学校,忽视对一个人斯文、品格的培养,它们的产品很难满足乡村对“合格的”民间知识分子的要求。这使得乡村学校与其所在的乡村的格格不入。

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近百年的公立教育的变迁,并没有对农村发展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家庭教育的兴起确实是对公立学校、私立学校的反抗,但并不代表家长对“人的教育”或者乡村需要的“教育生产的人”感兴趣,家长对学校的失望,是对升学率的失望,家长对“优质的应试教育资源”的需要,来源于在国家力量引导下的家庭对城市的想象和接近意图。作为嵌入乡村的学校,却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步步衰败,作为这些学校生产的人的家长们,在国家力量与城市想象的双重催化下,一代代地引导自己的子女远离着乡村,却又不能抵达城市。许多年过后,就成了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农村教育:“儿子、孙子、疙瘩们,传也传不完”。

### 三、国家力量

现代乡村学校成为“村落中的国家”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作者的描述里,在1945年-1949年期间,解放区的新式学堂成为一种革命性的组织,用以组织和集中人民的力量,推动解放事业,促进社会转型和变迁。在此之前,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或者说中央政府的控制)到县为止,随着现代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加强,乡村基层组织才逐渐成为国家控制社会的基本手段。在这一个阶段,乡村学校扮演了后来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部分角色,校长和村长往往是相同的地方精英构成。在随后的共和国建设时期,乡村学校作为国家机器的功能延伸参与本地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加强。

教育财政问题是居民、学校与国家之间互动关系变迁的一个明显的标志。以乡村学校学费为例,我们可以发现面对“村落中的国家”背后的国家力量时,村民是较为被动的。解放初政府为了迅速确立执政的合法化,在农村教育水平普遍很低的情况下,实行了免费教育的方针。随着学校成本的提高,在社区内(如一个村庄里)实行教育费用的分担,一个可以观察到的现实是,在这一个时期和随后的集体化运动时期,校舍的建设多半是由村民尤其是学生家

长出料出工建成的。在集体化(一大二公)运动时期,学生入学只需要缴纳书本费。在“文革”时期,学校再一次免去了学生的学费,但这一个阶段的国家教育趋于瘫痪。尽管如此,这也是农村教育在国家教育体系上最辉煌的时期,政府提倡教育农村化,在很多村庄,甚至办起了高中,这是现代乡村学校的一次“在乡在土”,尽管教育质量不尽如人意。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实行“以乡镇为主”(1985年农村义务教育财政分权改革的确立),教育经费也采取多渠道筹措和分担,这一个时期由于城乡差距的拉大,农村义务教育仅仅勉强维持。1993年国家制定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政策的强制主导下,政府主要对校舍和师资进行了投资,由于基层财政的困难以及上级财政没有同步保障,“普九”欠债成为农村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时期村民分担学费及学校债务的比例达到历史的高度。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过后,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资助,进而在2005年开始实行的“保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新机制”,又一次实现了农村的免费义务教育。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乡村学校比乡镇政府更像一个国家机关:整齐的校舍、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标语口号、象征国家权威的旗帜、课程设置和学校管理,无一不体现着“遥远国家”的在场。乡村学校像是一个嵌入在村落社区的“国家”,作为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的机器(或者工厂),却又不属于村落。1949年到1979年的建国头30年期间,乡村学校长期低层级运行,这与彼时的国家政治经济结构相一致,全党全民办教育保证了农村教育乃至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并为农村精英向上流动提供了一个相对有效的途径。同时,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学校教育(或者国家教育)在与农村本土知识的竞争中,尽管空间上、话语权上占据了统治地位,但未能真正征服本土知识和乡村文化传统,这个时期在村落内部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通过传统渠道成长起来的几代乡土知识分子,国家教育培养出来的“新人们”尚没有表现出与村落日常生活的格格不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总结过中国乡村的种种特性,但他没有从更深层次分析这些特性产生的根据。<sup>[5]</sup>杜赞奇则细致地研究了乡村社区与政权的博弈,他认为,“国家政权建设”与现代化进程相连紧密,尤其是国家科层系统、行政机关架构和社会经济机制,而“权力文化网络”则与传统乡村社会联系密切,主要包括小农经济、乡绅文化、土著信仰。<sup>[6]</sup>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乡村学校的建立,与政治宣传相配合,迅速在头几代人之间确立了政权合法性,塑造了人民的集体信仰。这与路易·阿杜尔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将学校视作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论述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国家教育的推行和普及,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迅速增长积



累了人力资本。然而,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村落之于嵌入其中的“国家”,始终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角色,如果这个“村落中的国家”的运行,是脱离村落的需要,甚至汲取村落的水分的话,对于村落而言,是一种真实的伤害。

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乡村的现代小学扮演着促使社会化中的主体分离于传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外,与现代社会‘抽象体系’实行性体结合的角色。在乡土社会中确立的现代学校,已经以一种新式的文化品格的面貌为地方民间社会所接受,成为渗透至深的象征力量”(王铭铭,1999<sup>[7]</sup>)。一直到今天,乡村学校的“国家力量”一直没有消失,从小学、初中到高中,教育的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都是升学,学校从一个培养人的田园,变成了培养人才的机器。更为可怕的是,一旦升学失败(意味着教育的失败),学生要被迫从学科化的流水线上退出来,返回到乡村生活之中,他们在脱离乡间和民间的学校围墙之内度过了宝贵的少年、青年时期,这时候发现已经不再适应原来社区的生活,从而走向更多艰难的命运。

对于那些在走过应试教育独木桥,成功升学的学生来说,他们或许正迈步走在社会主义的光芒大道上,走向国家和城市通过教育赋予他们的“生活的抱负”。在考试,尤其是高考日益成为贫困农村与富饶城市之间的资源竞争的今天,农村学生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走在这条艰辛的路上。而为他们远行提供养料的农村,却很难等到他们反哺的那一天,就像村前的流水,一去就不回头了。

#### 四、城市想象

在很多地方,乡村小学都已经倒闭了,学生集中到乡镇的中心校。那些衰败的校舍在成片的房屋和田野之间,显得过于孤独。远离城市的农村通过乡村学校获得了城市生活的展望和想象,并试图通过教育实现这一愿景。随着农村社区人口的缩减(归功于大量的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样的乡村学校也在进一步地离开农村社区,作为“村落中的城市”,它们不可能扎根于农村,却又无法将农村子弟带入那些“美好的城市”。农村教育的角色越来越像是城市教育的“山寨品”,并没有提高学生的生存技能,以适应和改良农村社会。

这是伴随着农村社区卷入城市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来的。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农村,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形态都在消失,与此俱增的是对市场的认可,对城市生活的想象。表现在乡村学校里,学校外观的进一步正规化,学校内容(教学、课外活动)的进一步拟城市化,都是在城市导向的教育设计引导下完成的。我们在前面提到,国家力量嵌入乡村,对乡村的损伤是细微且可弥补的,而城市的“圈地运动”则是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社会带来巨大的损伤。学

校开始成为外部世界、城市生活的排演场,与学生所成长的农村社会环境无关,学生在围墙之内的校园里获得关于城市的扭曲想象和伪生活经验,逐渐分化脱离农村,农村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本土知识的代际传播也趋于中断。

教育现代化的设计,实际上是教育的城市化,农村教育一下子站到了城市教育的对立面去。而正在走向现代化或者走过现代化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没什么区别,除了名字上还保留“农村”二字,农村教育与其根植的农村社会割裂了联系。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的命题来看,现行的农村教育并不能反映农村社会的共同生活,也不能使受教育者获得改造这种社会生活的动力和能力。农村教育忍受着城市教育的“圈地运动”,农村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教育越来越远离它本来的面目,农村教育越来越远离农村的现实生活,越来越不像“农村”的教育,越来越像“城市”的教育。这种教育设计带来的危险是,这种“城市教育”在农村是完全失效的,学生在接受了若干年学校教育,过后发现它在改造农村的广阔天地时没有作用。这也是越来越多农村家庭开始拒绝教育的原因。

造成农村地区教育滞后的原因非常多,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村地区教育的定位、价值和目标(目前基本上是以升学为唯一取向)与农村改造和农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的需求不一致。在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轻能力,重书本知识轻社会实践,重考试升学轻素质发展等偏向。这样的结果是教育与当地生产生活、社会经济发展、民族文化遗产严重偏离,极大地制约了教育在农村社会进步中关键的促进和服务作用,教育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并不一致。城市中心主义导向下的农村教育陷入困境,我们会问:“农村教育为了什么?”如果我们在农村地区依然大力发展传统以城市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应试教育或者与农村社会严重脱节的教育(事实上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而忽视农村教育的特点,这种教育将是与农村教育完全无关的教育,是脱离了农村改造和建设需要的教育,它最终的结果是导致农村教育完全退出我们教育设计的视野,这种教育取向对农村社会的改造与进步的损伤是不可估量的。

而我们倒回几十年,在近代中国,陶行知、黄炎培、梁漱溟等一大批教育家,在各种教育思潮,尤其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将视野从大城市转向中国广袤的农村,将平民教育思潮引向乡村,探索中国农村教育的新出路——农村教育应该显现出与城市教育不同的个性化模式。其中晏阳初在推行乡村教育时提出“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穷,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的四种教育,是契合农村发展实际的,迄今仍然有重要的启迪作用。但是我们仍然不否认城市想象之于农村教育的重要性,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共同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共同体。

如果我们将农村教育的目标局限于为农村建设培养本地人才的话,从城

市中心主义矫枉到了农村中心主义,似乎符合“教育即生活”的要求贴近了农村实际,实质上却是造成了农村教育的封闭,阻隔城乡教育的融通,强化城乡教育的二元分割关系。我们的教育需要培养改造社会的动力和能力,对于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而言,它们在同一个体系内,都要培养具有现代文明素质、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公民。农村所需要的教育,既不能以城市教育为导向,也不能独立于城市教育。农村所需要的教育根植于农村社会的需要,根植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成为他们所期待的“那个人”的需要。

## 五、人民教育

我们再回到作者叙述的故事里,作者在时间线上展开,描绘了作为“村落中的国家”和“村落中的城市”的乡村学校如何在近百年里容纳个人、地方和国家之间的博弈和调整。处于国家力量和城市想象的夹缝之中的乡村学校,一步步走向衰败,家长对乡村学校所代表的公立教育质量的不满,导致一些乡村知识分子投身办教育,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私立中小学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重要原因。由于举办者自身的局限,商人天然的逐利性,许多私立学校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繁荣过后也步入公立村小的落后道路,村民与公立学校的矛盾转化为村民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对立,作为对学校教育(公立和私立)的不满和抵抗,一些学生家长开始谋划联合聘请声望和教学好的老师到家里教学,不只作者在文章里进行田野观察的地区,近年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中国式家庭教育”的兴起。

由此我们需要思考一个问题,在我们现今对农村教育所施行的政策里面,财政投入是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发现家长对学校教育质量的不满,只是对学校升学率的不满。在国家力量面前只能处于被动局面的村民们,在面对城市及其所意味的经济资源强势的时候,这个局面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当然,我们在分析国家政权与本地社会的关系时发现,两者并不总是对立的,或者说国家政权向乡土社会的渗透并不总是成功的,从民国时期开始,由于现代新式学堂在乡村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本地的传统文化,然而彼时的国家权力的扩张却受限于中央政权的能力。同样的情形我们在90年代中后期也看到了,由于乡村基层政权能力(财政能力、政治动员能力等)的下降,乡村学校的运转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城市通过资源强势和市场经济的力量,时刻在谋求对农村进行“圈地运动”,争夺资源和市场。在广袤的农村大地,陷入焦虑的家长们、时而在场时而不在场的基层政权、形形色色的本地精英集团、充满诱惑的城市经济生活,它们共同将学生们装入一个名叫“乡村学校”的围城里,我们要问:从这样的学校走出来的人是我们所期待的“那个人”吗?



当然除了“那个人”,我们或许还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观察乡村学校。作为人民教育典范的乡村学校(称其为人民教育意指在发展过程中广泛发动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一方面是在国家力量和城市想象的夹击中培育下一代共和国人民的场所,另一方面,作为嵌入村落的“国家”和“城市”,那些在学校围墙周围的村落中的人们,也在乡村学校里不断寻找自己的定位,甚至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博弈、合谋或者对抗。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生动地描述了在村庄内,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对抗过程。20世纪90年代,作为乡土知识分子和本地“能人”的私立学校校长,在面对乡村公立小学教育质量难以满足家长需求的局面下,举办了私立学校,在这个时期,私立学校主要通过缩减成本来实现低收费,与公立学校争夺生源。与私塾在乡村的延续一样,私立学校的兴起说明了现代教育在乡村社会的推行不力,不仅在于乡村社会有强大的反对力量,还在于政府财政能力的不足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郭建如,2010<sup>[8]</sup>)。趋于瘫痪的村小在面对私立学校的市场竞争的时候,难以依靠教学质量和教育收费获取竞争优势,最终破产。

作为村小的顶头上司,乡镇中心校的校长则试图假借国家力量和政治契机(如普九验收、升学资格、两免一补等)对私立学校进行打压,以期实现对私立学校的控制。面对公立学校的政治压力,村庄内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行为选择:部分人根据历史上的政治事件和个人竞争,选择对政治权威、国家力量屈服;而一些本地“能人”则依靠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和外部政治力量(如越过乡镇政府直接向有私人关系的县政府求救)来牵制本地势力。

私立学校陷入困境也来自于国家的政策突变,国家实行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小学和初中学生上学几乎全免费,而私立学校的学生无法享受到“两免一补”的政策待遇,导致私立学校的运营举步维艰。然而公立学校在竞争中的获胜,并不代表学生们就能够获得他们所期望的教育。于是出现了文章中一开始的故事,家长们对私立学校陷入蝇营狗苟的抗拒,又对低下的公立教育质量无奈何,乡村学校疲软的状态使得家长思变,聘请老师到家里来教学的方案自然而然地被提出了。当然,这种新的教学形态能走向何处,乡村学校和农村教育能走向何处,作者并没有回答。在这项家乡研究中,作者的“个人背后,总是拖曳着长长的历史阴影”,然而历经百年的乡村学校变迁,在“人民教育人民办”的道路上左右摇摆,至于“办好教育为人民”,到今天看来,还是过于近似那个影子吧。

## 六、以此至何?

尽管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只是对一个村庄进行了个案研究,然而我们通过

文中展示的这幅村庄社区里的真实教育图景,窥全豹之一斑,由此丰富了我们对于我国农村教育的认识。可以这么说,曾经发生在仁村土地上的教育变迁,在祖国的每块土地上都似曾相识,仁村的教育是什么样子,我国农村教育就是什么样子。进一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何以至此?对于这个问题,作者自己也没有明确地回答,他只是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描述,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然而,作者也没有回答另外一个问题:以此至何?

今天的农村教育何去何从?从“村落中的国家”的角度来看,农村教育仍然富有国家机器的色彩,在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说”的引导下,“人”更多地成为了“人才”,忽视了对人的心灵教育,而那些没能够成功成为“人才”的乡村学生们,也许就将被迫走入黯淡的命运。从“村落中的城市”的角度来看,农村已经是而且还将长期是城市圈地运动的对象,学校围墙之中的学生,一旦升迁失败,也不能适应农村的本地生活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对于农村来说,乡村学校已经成为村落中的“飞地”(如今大规模推行的农村寄宿制学校工程,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离土又离村”的情形),学校生活与本地日常生活脱节,农村教育成为陶行知所形容的“鸟笼子式的教育”(翁乃群,2009<sup>[9]</sup>)。近百年来,也没有给村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带来“大跃进”,农村教育给那些生长在村落中的学生提供了远方的想象,却不能给他们的命运带来改观。

显然,农村是不需要这种教育的,那么我们要问:农村需要什么教育?对于村落中的年轻一代而言,尽管“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每一条路都不如想象中的通畅。在传统的“革命、招工、参军和升学”四条通往城市生活、上层社会的道路上,大多数人都显得步履艰难,只有极少数的人能够通过层层考试的选拔,最终实现“鲤鱼跳龙门”的梦想,而更多的人,徘徊在农村和城市之间,不知何处才是归乡。

在国家力量和城市想象面前处于被动地位的乡村学校,很难自己说出什么是农村社会所希望的教育,村民们也渐渐失去了办学、求学的积极性(读书无用论近年来又开始有在农村社会抬头的倾向)。问题不仅仅是在农村教育,汪丁丁认为,“传统社会的上层建筑早已‘礼崩乐坏’,取而代之的是杂乱且无根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其人生主张和政治主张”,“中国孩子沦为个人奋斗的牺牲品——只不过,那究竟是他们自己的个人奋斗还是他们家庭的奋斗,他们未必清楚,而且他们的父母也未必清楚”。<sup>[10]</sup>

不过,当我们再回首中国乡村学校百年变迁的时候,也能够找到成功的例子。贵州石门坎的教会学校一度繁荣,正是因为学校的教学设计和结果符合本地发展的需要,从而调动了社区内农民的办学、求学的积极性。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强调农村教育对于乡村社会的支持作用,而忽视教育“向上”的功

能,这将带来新的城乡不公平和对农村社会的剥夺。如翁乃群所述,农村教育“应该因地制宜,以农民、农村、农业的发展为本”(翁乃群,2009),对于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人,要使得他们“榜上有名,脚下有路,进能上,退有路”。毕竟究其根本,教育是“成为人”的过程,对于农村教育而言,就是如何使村落中的人们成为他们自己,如何找到来时的路,如何找到属于他们自己的抱负(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城市的),找到能够施展和满足抱负的那条路。

#### 参考文献:

- [1] 司洪昌. 嵌入村庄的学校——仁村教育的历史人类学探究[D].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2] 容中逵. 传统与现代的交锋. 百年中国乡村教育变迁的实践表达[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 [3] 李书磊. 村落中的“国家”——文化变迁中的乡村学校[M].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 [4] 李红婷. 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D].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10. 在另一篇文章中, 李甚至认为乡村学校还是“村落中的集市”. 参见李红婷. “半耕时代”乡村教育发展的困境与出路——以湖南大金村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 2010, (1).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6] 杜赞奇. 文化、权力与国家. 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 王福明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
- [7] 王铭铭. 教育空间的现代性与民间观念——闽台三村初等教育的历史轨迹[J]. 社会学研究, 1999, (6).
- [8] 郭建如.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变革与义务教育发展. 社会学透视——从税费改革到农村义务教育[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 [9] 翁乃群. 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 [10] 汪丁丁. 教育的问题[J]. 读书, 2007, (11).

## Village Schools: Why Do They Become, What They Are Today and What They Will Be Tomorrow?

YE Xiaoyang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an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thesis which discusses the changes of Chinese village schools. Regarding village school as a “state power in village” and “city imagination in village”, the author reveals that public education in rural areas last century did not play its due role in rural areas’ development, and village schools declined step by step. Students graduated from village schools move away from the village, but could not reach the city either. This paper attempts to make a discussion on “Why Chinese rural education comes to today’s dilemma” and “Where is rural education going”.

**Keywords:** Rural education; village schools; “state power in village”; “city imagination in village”